

〔美〕苏珊·雅各比 著

苏联学校内幕

辽宁教育学院教研部外语教研室 译

3

研究所

苏联学校内幕

〔美〕苏珊·雅各比著

辽宁教育学院教研部外语教研室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
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78年·沈阳

SUSAN JACOBY

Inside Soviet Schools

Hill and Wang

A division of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ew York, 1974

根据纽约法勒-斯特劳斯-吉罗公司所属
希尔与王氏出版公司1974年版译出

苏联学校内幕

〔美〕苏珊·雅各比著

辽宁教育学院教研部外语教研室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字数：150,000 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张：7 $\frac{1}{2}$

1978年12月第1版 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90·582 定价：0.57元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苏珊·雅各比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自由撰稿记者。书中就苏修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等方面的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读一读这本书，对了解苏联学校的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

但是，作者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大肆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肆意歪曲、攻击列宁和斯大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对此，我们必须予以严肃的批判。

我们在翻译本书时，对个别地方作了删节。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肯定会有不当甚至错误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七年九月

谨以本书献给不畏险阻将国情赐教于我的俄国人

献给我的祖母明尼·布罗德里克

目 录

前 言

告诫之言	(1)
1. 苏联学校	
——美国的神话与俄国的现实	(6)
2. 俄国的家庭	(23)
3. 幼儿园	
——儿童接触社会的地方	(42)
4. 小 学	
——头三年	(68)
5. 高年级	
——临近“现实生活”	(92)
6. 学校与家庭	(112)
7. 机会均等	
——希望与现实	(128)
8. 政治教育	(163)
9. 制度的产物	(193)
结 论	(225)

前 言

告 诫 之 言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有关苏联教育制度的文章连篇累牍地出现在美国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之中。我对于这些评论的主要异议就在于，它们没有指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没有认识到——外国人对苏联社会任何方面的了解都是有局限性的。

尽管政治局势缓和，苏联仍然是个对外国影响深怀戒心的国家。一切阶层的苏联公民都对未经批准而同外国人接触到感到忐忑不安。同来自国外的任何人保持长期的友谊，通常都引起克格勃（秘密警察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俄语字头）的注意。与外国人建立了友谊的苏联公民，常常被“请”到克格勃办公室进行令人厌恶和不安的谈话，以弄清这种联系的性质。难得在苏联住过一个月以上的旅游者和由政府安排日程的官方来宾们很少领悟到，他们对存在于苏联公民同外国人的关系中的阴暗潜流的无知，倒使他们省却了许多烦恼。一位学戏剧的美国学生刚到莫斯科时对我说：“我到这里来完全没有政治目的，政治——你正在谈论的这种疑虑——不会干扰我研究戏剧。”在后来的几周中，她的想法就改变了。她说：“在布拉格，我们住在捷克演员家里，在华沙排练时，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活动。而在这里，如

果没有官方向导在场，甚至和一位俄国演员喝一次酒都办不到。这里多的是为和平与友谊的干杯，但听不到关于戏剧的真实情况。”这种受限制的气氛使希望了解教育、科学、农业或苏联社会其他方面的来访者大伤脑筋。

对诸如教育之类的专业领域的评价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问题。专家们也许受过很好的训练又具有丰富的经验，很能作出准确的评价和比较，他们也自然会受到苏联当局的热情接待。不过，他们一般对俄国文化和俄语的知识甚少，而那正是能使他们理解其所见所闻的知识。如果是会讲俄语的、对苏联整个社会非常了解的外国人请求参观学校或任何其他机构，则往往碰壁。获得官方批准的那些人，有时缺乏特定的专业经验，不能与他们本国的同类机构进行正确的比较。一个美国人，如果对自己本国中学的生物课教学情况一无所知，听苏联中学的生物课是毫无益处的。

1969至1971年间，我作为一名自由撰稿记者，也作为《华盛顿邮报》记者安东尼·阿斯特拉汉的妻子，在莫斯科度过了两年。我会讲俄语，并曾作为一名《邮报》记者从事过几年美国教育方面的报道工作。我们到达莫斯科后，我本想运用我在美国当记者那样的方式来考察苏联学校——一连几天或几周在班级中听课，数月数年之后再回到这些学校中来。然而，我很快就明白了，苏联当局是不准有这种自由的。我告诉两位苏联记者，在美国，只要和教师说一下，不必再同任何人商量就可以进出教室。他们都不相信。“这种事在这里是不可思议的，”一位教师刊物的编辑说，“我们必须得到学校校长和地方主管人员的批准，在某些情况下，

还必须得到在莫斯科的教育部的批准。”

每当我我和我的丈夫想参观任何地方单位——学校、工厂、农庄或医院——的时候，我们都必须向苏联外交部新闻司提交一份正式的书面申请。如果外交部官员愿意合作——经常是不愿意的——他们就同有关的政府机构联系安排访问。我在莫斯科呆了六个月之后，才第一次获准参观学校。对于那些预计在苏联仅仅逗留几个星期的官方来访者，外交部在安排日程时则比较愿意合作。

我是个记者和记者妻子，这种身份带来了特殊的问题。我丈夫因为写过关于持不同政见者和希望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的文章而遭苏联官员的冷遇。在我写作第一部书的过程中，我同十名各个方面的苏联人建立了广泛的非官方的联系。他们之中有受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有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①我和我丈夫经常受到克格勃特务的跟踪和刁难——特别是在同俄国朋友聚会的时候。倘若一位驻莫斯科的记者就政治上敏感的题材做了实事求是的报道，常常就会妨碍他对于基本上是非政治性问题的采访。

有一椿特别令人伤感的事件牵涉到一个莫斯科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曾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为此，我写了一篇三千字的文章。校长是位热情奔放、充满自信的人，他邀请我和我丈夫随时去重访他的学校，不必履行外交部方面的繁文褥礼。此种邀请实属难得，因而我们就高兴地利用这个机会想重访该校。但是，在一家苏联报纸载文指控我丈夫是国

^①《莫斯科对话》（纽约，科沃德-麦卡恩-盖根出版公司，1972年）。

际犹太复国主义的代理人并要求把他驱逐出境之后，访问被猝然中止了。校长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打算再次参观他的学校的话，就得向外交部提出要求；而外交部却通知我们说，校长觉得我们会歪曲他所提供的情况，因而不愿意接待我丈夫和我本人。

尽管障碍重重，我还能够访问苏联某些地区的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这些地区包括欧洲部分的两个最大城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中等的俄罗斯城市普斯科夫、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第比利斯、拉脱维亚共和国首府里加以及爱沙尼亚共和国首府塔林。除了通过使人厌烦的官方途径安排的访问之外，我更多的是以非正式的方式突然闯入学校。在莫斯科，我习惯于随同那些正在访问的显要人物一道去访问我自己无法获准参观的学校。我对一个幼儿园的最富成效的访问，就是陪同妇女职业团前团长贝尼塔·B·华盛顿进行的。苏联官员把我当成了她的翻译。了解情况的另一条途径就是坐在公园里观察幼儿园教师怎样同孩子们一起学习和游戏。我常常出没于小学校附近的游戏场所。这样，我逐渐同许多教师交了朋友，虽然因为没有得到正式许可，不能邀请我参观他们的教室，他们仍然渴望同我交谈。

与短期访问者相比，能有机会在校外同教师、家长和学生接触，确实是我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我到莫斯科不久，一个根据美苏文化交流协定举办的美国教育展览会在苏联巡回展出了。这个展览会为我同教师、学生和记者的初次接触提供了方便条件，他们在我的两年停留期间向我介绍的有关苏联教育——以及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情况，都是很宝贵

的。

我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访问任何农村学校，特别是在西伯利亚、远东和中亚地区的农村学校。城乡教育的差别是苏联教育中最严重的问题，苏联官员们——象其他任何地区的官僚一样——并不期望把他们的失败公诸于众。来访的教育工作者偶尔也被带去参观集体农庄的学校，但那总是一些比较靠近城市的“模范学校”。至于苏联教育的最落后的乡村地区是禁止外国人进入的。我本人对农村教育的描绘取材于多种多样的苏联源泉——报纸、农村学校的教师、住在农村地区的朋友以及对农村学生之缺乏受教育机会深为关注的教育革新家们。我的描绘是不全面的，但我相信它是当今的局外人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一幅图景。

苏联学校

——美国的神话和苏联的现实

莫斯科第711学校占用着一幢并不显眼的深褐色楼房。在那里就学的，有一年级到十年级的八百名男女学生。苏联教育部常常选择该校供外宾参观。我们这帮美国人到达后，校长在礼堂里作了半小时神情紧张的讲演，表示欢迎我们。临结束时，他语气庄重地说：“生活不是静止的。学校也是如此。”

讲演一完毕，我们就被急急忙忙分成小组领到各教室去进行短促的参观。一个一年级学生，教师让他朗读一段关于“列宁号”原子破冰船的故事，他的双手不住地打颤。当时，我正挨着他坐在一张旧式的双人书桌边。我告诉他不要紧张，他读得很好。他悄悄地小声说：“我真害怕会漏掉一个字，那样的话老师要发火的，因为我给学校丢了脸。”在其他班级里，学生不分年龄大小，在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之前一律都背着双手，绝对安静地坐着。可是下课铃一响，男女少年们就失声叫喊着，推挤着，互相把别人的书本从手中打掉，一窝蜂似地拥向走廊。一位副校长很不自然地笑着说：“我们的纪律并不总是十全十美呀。”

莫斯科第 607 学校的建筑也没有什么特色，在校学生大约有九百名。校长是个比较轻松随便的人，体格象个摔跤运动员，不喜欢发表演说。他主动谈了他的一个看法，他说有些教育工作者墨守成规地干他们那一行太久了，当他们仅仅因为新思想之新而开始抵制每一种新思想的时候，就应该把他们撤换掉。他领着我们这群美国来宾在校内各处参观，一面还提议说，我们也许希望在我们特别感兴趣的班级，额外多花费些时间。

607 学校的学生、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似乎不大关心美国人会有什么看法。一位年轻的英语老师请我参加她和学生们一起谈话，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向校长请求通常是极重要的许可，校长却已经走到走廊那边不见了。在很多班级，学生们举着手，争先恐后地要求发言。他们——和第 711 学校的学生不同——没有象动物出笼那样拚命冲进走廊。课间只有一般的嗡嗡谈话声和笑声。校长显然受到学生的欢迎，在各走廊里学生都停下来和他说话、开玩笑。在我访问过的苏联学校中，这些轻松快活的交谈并不常见；在苏联，师生之间的界线比在美国要严格得多。

莫斯科的这两所学校，都是教育部选定供外国人参观的。两校间相距不过二十分钟的汽车路程，校舍和设备也大体相似。可是，前一所学校的师生行为拘谨死板，后一所学校的师生则显然是轻松愉快，享受着学习过程中的乐趣。倘若我是个俄国家长（或者是携带家属住在莫斯科的美国人），我会高高兴兴地把孩子送进第 607 学校，而一见到第 711 学校的景象，就会觉得万分憋屈。（莫斯科所有的外国居民——外

交官、新闻记者和商人——都有权利把子女送进苏联学校。但多数人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各国使馆办的学校。少数几个果真进了苏联学校的美国孩子，往往发现他们的这一段经历是大有益处的。）

莫斯科这两所学校的差异，本来不应该使美国人感到特别惊奇，因为在美国，家长和青年人也常碰到类似的情况。但当我讲起我在第607学校看到的那种比较开朗活泼的气氛时，很多访问过第711学校的人硬是不相信。一位外交官说：“俄国学校全由最高阶层来管理，所以一切事情都是完全合乎标准的。不是吗？”他谈出了美国人对苏联学校的一种最普遍的误解：它们全都一模一样。

美国人的这种臆断，或多或少是苏联的宣传所造成的。俄国人对于他们在教育方面的成绩，比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的几乎任何其他成就都更感骄傲。他们带着理所当然的满意心情指出，他们已经把一个大部分人是文盲的国家迅速地改变成了一个大部分人能看书识字的国家。苏联政府正式地大声地宣告：每个儿童都有完全同等的受教育机会。

学校是通向生活的大门。每个孩子在讲起他的未来梦想、讲起他长大以后想干什么的时候，都用“等我从学校毕业了”这句话开头，至于那个孩子是住在城市还是住在乡村，并没有什么差别。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学校课程都由各共和国的教育部拟定和审批，教育部对课程规定高低一致的标准。^①

^① 《卫星的建造是从哪里开始的》（莫斯科，新闻社，1967年）。

一些受人尊敬的美国学者已经胡里胡涂地、天真地接受了上述形象化的描述，并把它传达给了美国公众。这些学者面对一位美国督学或者一条美国新闻署发布的消息，都会表现出正当的怀疑，而今却欣然接受苏联对现实情况的官方说明（不管这种说明是来自大肆吹捧“制造人造地球卫星”的广告，还是来自在官方安排下与俄国教育工作者的谈话），确实难以理解。

虽然认为苏联教育千篇一律是一种误解，其中心实质却是正确的。苏联学校受集中控制的程度之大，大多数美国人都会觉得不可想象。教育经费由中央政府发给；莫斯科、列宁格勒、伊尔库茨克或者巴库的纳税人拒绝通过一笔公债的发行，并不能使学校关门。小学和中学的课程至少在大城市里是标准化了。在乡村地区，国家标准在原则上，而不是在实际上受到尊重。关于从西伯利亚到黑海的四千九百多万儿童的教育工作，由设在莫斯科的教育部制定主要政策方针，在某些情况下，由处于统治地位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制定。教育制度被一定时期政治上的突然变化所左右；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作出的决定，决定要求所有的中学生必须拿出大部分上课时间到工厂劳动。

赫鲁晓夫对学校制度所进行的笨手笨脚的个人干涉，也提供了一个很恰当的例子，说明对教育实行集中政治控制的局限性。强制性的工厂劳动引起了苏联教育界官僚集团中一些重要派系的强烈不满，许多教育工作者从未停止过对该决定的反抗，并力图削弱它对地方学校的影响。列宁格勒一位

六十岁的中学物理教师解释说：“当时有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策略，就是让最优秀的学生免去工厂劳动。当地的工厂厂长并没有表示不满；他对我们说过，作为工人，大多数学生对他并没有什么价值，反倒是个包袱。”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强制每个学生接受职业训练的企图，就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新领导之下被放弃了。

由经济、文化、语言和种族等因素所造成的教育上的差异，使集中控制的局限性更为明显了。苏联的政治制度有点象一个整块的巨石，因此很多美国人都设想苏联社会在文化上也是浑然一体的。教育，是苏联生活当中与这种假定相反的仅有的一个领域。中小学至少要使用六十六种语言上课，因为在构成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许多公民并不把俄语作为他们的第一种语言（甚至也不是说得流利的第二种语言）。学龄前教育是一个既定的国家目标，但全体苏联儿童当中，在七岁入学之前进入公立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不到三分之一。普及十年制教育——另一个国家目标——在大城市是个现实，在小城镇或在乡村地区还行不通。

苏联政府正在极力设法缩小这种与国家规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教育差异。乡村地区（苏联人口中的44%仍然住在乡村^①）的学校在各个方面都比不上城市学校。俄国集体农庄的儿童在教育上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同美国城市贫民区的黑人儿童所面临的一样严重。集体农庄庄员的孩子从中学退学的可能性，比城市的孩子要大得多。受过中学以上的各种正式

^①1970年苏联人口普查。

教育的城市居民，在数量上以四与一之比超过了受过大学教育的乡村和农庄居民。

大多数苏联官员都会竭力否认美国黑人和俄国庄员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然而他们承认，缩小城乡教育差别对于他们国家的前途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情况靠自我吹嘘是掩饰不了的，”一位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对我说，“它是必须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纠正对待出生在集体农庄的孩子们的不公平作法，那么，我们在很多其他问题上都要失败。我国人民受这种处境之害的太多了。”现今的苏联领导人，赞同这位社会科学家关于农村教育危机紧迫的观点。1973年7月，党开始施行一项以大量投资在集体农庄兴建新校舍的七年规划。宣布该规划的条令，异乎寻常地公开承认了乡村学校的教学工作往往“低于现代标准”。

我本人在苏联学校里的经验说明，要想查找教育质量上的重大差别，不必从城市跑到农村，或者从一个加盟共和国跑到另一个加盟共和国去。差异的产生有很多是由于一些更为普通平常的原因，美国的学生、家长和教师们对那些原因恐怕都是熟悉的。学校办得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的人品。如果校长以信任的态度对待他的工作人员，并在业务上给予尊重，他就能把教师吸引住，使他们不愿意离开——在苏联和美国都是如此。第607学校的一位一年级老师对我说：“谁要是想离开这所学校，他一定是发疯了。我们的头头是和大家站在一起的。”尽管苏联的教育经费由中央统一支配，有些学校的行政管理人员还是比别人有门路，能想方设法给他们自己的小天地弄到更好的图书和设备。